

尤侗論稿

薛若邻 著

中國戲劇出版社

216

尤侗论稿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字数156,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6.875 插页2

1989年7月北京第1版 198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50册

ISBN7-104-00115-8/K·10 定 价 2.55元

薛若邻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作者近影

序

张 庚

薛若邻同志的《尤侗论稿》要付印出版了，让我写篇序。我读他的书稿，知道他是下了很大功夫，旁搜博览，而非仅仅对尤侗作了孤立研究的。因此，他对人物和作品所作的评价，都非仅个人感想，而是有根有据的，所以具有说服力；对有些问题的论断，特别令人信服，这是这本书的长处，值得多说几句。比方对尤侗的气节问题，过去有各种评论，多半偏于否定或批评方面。我们知道尤侗是由明入清的人，明末他是诸生，到清朝他又去应试，有些人论及这点，就认为他气节有亏。若邻对这个问题却不这样轻率，他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尤侗和许多由明入清的人作了对比，分析了他们各自不同的社会地位、遭遇、恩怨，以及在“鼎革”当时的具体表现，并且结合当时知识分子对于气节这一概念的理解，都作了细致而具体的分析，然后作出论断：尤侗不存在气节问题。这样的研究方法，应当说是比较科学和客观的。

若邻在分析尤侗这个人（还有其他的人）时，不是用一个简单的概念去套，而是充分注意到人的思想感情的复杂性、可

变性等情况的。他指出尤侗由于久困场屋，对于明末的当权者和官僚机构绝望，而且有敌对情绪；对于清政权也不是一贯满意，在他受了打击和见到清兵对于汉人知识分子的压迫之时，也是很不满的。这位大名士，以穷愁潦倒终其一生，是不足为怪的。

我觉得若邻对尤侗所勾画的这个形象是具有真实性的。既有阶级性，也有时代性，还有他“这一个”的个性。

对于尤侗的作品，若邻也是从这些客观、具体的条件出发去作分析的。肯定了它的优点，指出了它的不足和缺点。由此得出结论：尤侗虽以诗和戏曲同样得名，但他的戏曲比诗更好，他的戏曲比较强烈地反映和表现了科举场中的黑暗，而这一方面，却是过去的戏曲作家较少涉笔过的。

在分析作品时，也同样论及文艺上的传承和影响，但我觉得比起论时代、社会对尤侗的影响来，似嫌粗略。

若邻长期从事中国戏曲志这部三十卷大型文献丛书的组织和指导工作，它是国家重点艺术科研项目，按省、自治区、直辖市立卷，全国有数千人参加编撰，可谓工程巨大，队伍浩荡，对戏曲领域的资料建设、理论建设和队伍建设，将起到促进作用。他们为了集体攻关，每个人都牺牲了自己的研究课题和计划。多年来，我一直领导这项工作，了解其中的甘苦。自然的，若邻这几年的文章也少了，但他仍努力探索，挤出时间完成了尤侗的研究，可以说是若邻投身于戏曲志的同时的又一个成果。看到他经过辛勤耕耘后的收获，我感到特别高兴和欣慰。

是为序。

1988年4月13日

目 录

序.....张 庚

一、引论.....(1)

二、明清易代与尤侗之气节.....(5)

三、生平和思想.....(33)

四、清初诗坛与尤侗.....(101)

五、尤侗的戏曲创作.....(139)

一、引 论

尤侗是清初著名的戏曲家和文学家。在那山谷陵替、改朝换代的时代社会大变动中，文坛风气却似乎没有受到多少震荡。譬如“开国之初，沿明季余习，雅尚词章，其时人士，皆用力于诗文，而曲非所习也”，^①当时的风尚仍然是轻视戏曲，目之为“小道”。士大夫品评作家，往往也以诗文而论，认为尤侗诗文的成就要大于戏曲成就。这样的一种论定，应当说是片面的。其实，尤侗不但是一位在诗文创作与戏曲创作方面都取得成就的作家，而且他的戏曲创作的成就还要高于他的诗文。但是，历史常常会恶作剧般地捉弄人，埋没一个作家应有的声望。尤侗的代表剧作《钧天乐》问世不久便遭到查禁，梨园刚刚演出一阵子就不敢再演，文坛和民间也就渐渐淡忘了这出揭露和批判封建科场黑暗的优秀传奇，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它的作者也都渐渐生疏了。本书的写作初衷就是想通过一些初步的研究，把尤侗及其剧作放到应有的历史位置上。

尤侗，（1618—1704）字同人，更字展成，别字悔庵，

^① 《吴梅戏曲论文集·中国戏曲概论·清总论》。

号艮斋，又号西堂。青年时自称三中子，晚岁自称西堂老人、鹤栖老人、艮翁。江南长洲（今属江苏省苏州市）人。清顺治九年以拔贡授永平府推官，在任五年，因细故罢归。康熙十七年诏举博学鸿儒，翌年中式，授翰林院检讨，与修《明史》，居三年，抱负难以施展，辞归。终老家乡。《清史稿》、《清史列传》，《乾隆苏州府志》、（包括以后的续志）《康熙永平府志》（包括以后的续志）有传，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潘耒《遂初堂文集》、沈德潜《国朝诗集别裁》、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郑方坤《本朝名家诗钞小传》、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均有他的传略。好友朱彝尊为他撰墓志铭。

尤侗才学富赡，博览群书，勤于笔耕，著述甚丰，戏曲有传奇《钧天乐》、杂剧《读离骚》、《吊琵琶》、《桃花源》、《黑白卫》、《清平调》，（《李白登科记》）合称《西堂乐府》或《西堂曲腋》；诗文有《西堂全集》、《西堂余集》、《鹤栖堂稿》^①等。

尤侗的戏曲创作虽在当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他的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却是非常坎坷的。

顺治十三年，尤侗在永平府推官任上，以“擅责旗丁”的罪名被降调，他一气之下，挂冠而去。这一年，尤侗创作了杂剧《读离骚》，借才高命蹇、不为人主所容而致放逐的屈原

①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作《鹤栖堂文集》，不注卷数。李桓《国朝耆献类征》，《清史稿》作《鹤栖堂集》十卷。朱彝尊《曝书亭集》作《鹤栖堂稿》十卷。秦瀛《康熙乙未词科录》、《康熙征士录》亦作《鹤栖堂稿》（不注卷数）。朱彝尊与尤侗同举博学鸿儒，俱在史馆供职，《曝书亭集》中谓《鹤栖堂稿》而非《鹤栖堂文集》或《鹤栖堂集》，当属可信。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六卷本《鹤栖堂稿》（康熙板），诗三卷、文三卷。十卷本待查。

以“自况”。顺治十四年，爆发了震惊朝野的江南科场案，尤侗以科场丑闻和弊端为题材，创作了别具一格的传奇《钧天乐》，痛快淋漓地控诉和揭露了封建科场的黑暗和腐败。此两剧的问世，不但奠定了尤侗的戏剧创作主要是以文人的坎坷困顿为其基调，也使他声望日高，名传禁中。其后，他又创作了杂剧《吊琵琶》、《桃花源》、《黑白卫》，最后一出《清平调》脱稿时已是康熙七年了。尤侗是一位长于反映清初知识分子历史命运的剧作家，他以自身的不幸，从社会生活的不同角度，反映知识分子的苦闷、徬徨和困厄，这是元代杂剧作家较少触及的领域，也是明代传奇不多窥见的作品。这使他的剧作有如异军突起，独树一帜。

创作上具有开拓精神的题材，常常也是敏感的题材，有时是要承担风险的。《钧天乐》刚刚问世，尤侗本人便在搜逮之列。乾隆年间黄文暘“奉旨”撰《曲海总目提要》，竟弃《钧天乐》不录；他的《西堂杂俎》在乾隆时被列为“禁书”，纪昀“奉敕”纂《四库全书》竟弃而不收。后人不察，或囿于偏见，在对尤侗的评述中常见不实之词，失之公正。如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中就说：“西堂人品，余素薄之。”认为尤侗明末“注名社籍，驰骛声气，……及鼎革时叫嚣诅骂，一以俳谐芜鄙之词，寓其假饰忠孝之意。……未几而列仕籍，膺徵车”。意思是说尤侗对明王朝“假饰忠孝”，实际上并不忠诚，还是做了清王朝的官，指责他政治立场反复，缺乏气节。建国后的文学史、戏曲史除少数一两种外，对尤侗的评价皆欠允当，有的甚至归之为“尤侗之类”，这实在是西堂的厄运。究其原因，大抵有三个方面。一、对尤侗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例如在他的剧作中闪烁着的反封建科场黑暗和腐朽的光芒，就似乎不曾充分地给予

评价；他的诗歌反对模仿，主张抒写“性情”，似乎也不曾充分地加以注意。二、尤侗的戏剧主要描写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坎坷遭遇，这本来是丰富了创作题材，拓宽了创作领域，但是在过去的“左”的思想的干扰下，即便是反映新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的作品，都还不能得到公正的待遇，更何况是几百年前描写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的作品呢，这就注定了尤侗的戏剧很难获得应有的历史地位。三、对尤侗的“人品”，缺乏历史主义的、实事求是的考察，尤其是不能联系清初的社会环境和知识分子的心理，而是过分看重了他与清王朝合作的行为，在“气节”的问题上来做文章。

可以说，尤侗的生前死后，都是不幸的。

尤侗在他八十七岁的一生中，作官仅仅八年，还不足十分之一的时间。明末，他虽然已经是个踌躇满志的诸生，（秀才）但在乡试中却久困场屋，屡试不第，无法跻身仕途。易代之后，他希望自己的才华能够得到施展，于是采取与清王朝合作的态度。他重新以童生的资格参加考试，取得清王朝授予的诸生。然而，他又被乡试的门坎拦住，经过七年之后还是没有跨越过去，终以“拔贡”授官，身列“仕籍”。

究竟应当如何评价尤侗在清初通过应试身列“仕籍”，怎样衡量他的“人品”？这是研究尤侗首先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我们这里不妨将他与明清易代之际的一些故明士大夫对清政权的态度作些对比，同时结合他自身的思想状况，来探讨一下有关尤侗的气节问题。

二、明清易代与尤侗之气节

一六四四年甲申三月十九日，闯王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结束了近三百年的明王朝统治。可是，仅仅四十二天，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就出现了逆转，手握兵权的宁远（今辽宁省兴城市）总兵吴三桂开关纳款，投靠了新主子清王朝。五月，清兵入关，占领北京，宣布君临天下。清廷随即用兵西北、中原，继续追击李自成农民军。在取得一系列军事胜利之后，便于一六四五年乙酉春夏挥兵南下。在这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年月，既编织着满汉地主阶级共同镇压人民革命的悲惨旋律，同时又谱写着清王朝统一全国的胜利乐章。

崇祯帝朱由检自杀之后，朱由崧从河南逃往南京，继位称帝，定国号弘光。朱由崧登上皇帝宝座之后，荒淫无耻，终日玩乐，毫无恢复进取之意，权奸马士英、阮大铖当道，趁机杀戮和排挤正直耿介的朝士。君臣腐化至极，恣意享乐，弘光以吃虾蟆壮阳，马士英以斗蟋蟀为趣，当时江南人民乃呼弘光为“虾蟆天子”，称马士英为“蟋蟀相公”。

南明政治腐败，地主阶级醉生梦死，社会矛盾丛生，无法形成整体强大的抗清力量。国内到处是铁与火、剑与血，而弘光

君臣却置之不顾，只知淫逸享乐。苏州府太仓人陆世仪写道：“乙酉元夕，娄城（太仓）盛张灯火，户皆悬綵，有感而赋：塞北旌旗乱，江南采邑多。敷天犹有泪，薄海但闻歌。游女拖珠珥，王孙曳玉珂。太平诚足乐，九世奈仇何。”^①旅居苏州的湖广诗人顾景星也描绘了这座城市的乙酉元夜：“玉琯阳回景渐舒，江东又是一元初。六街箫鼓迎春节，万里风云赋出车。信玺归来河北使，蜡丸时下武昌书。姑苏台畔梅花发，载酒还容问卜居。”^②一六四五年乙酉四月，就在南明小朝廷徵歌逐酒，沉溺风月之际，清兵包围扬州，史可法独木难支，城破被执，不屈殉难。清军用七天攻下扬州，却在这座繁华的城市烧杀了十日，随即乘势进逼南京，弘光帝出逃，南明小朝廷仅仅一年，就土崩瓦解了。

清朝入关，进军江南，目的是统一中国，当时也只有清王朝能够完成这个历史任务。明王朝灭亡之后，当时国内还同时存在着几个政治实体，即李自成政权、张献忠政权、福王政权、唐王政权、鲁王政权、西藏政权、蒙古政权等，他们之间矛盾重重，势同水火，无论其中的任何一个政权，都无力实现统一。这统一的大业，落到了清政权的身上。当时历史固然要求统一，肯定统一，但是，清廷对全国广大地区，尤其是江南的汉族人民，却实行极端的民族高压政策，肆意欺凌压榨、污辱屠杀，形势极其惨酷。当此之时，一批有志节的故明文士，遂不惜身家性命，坚决抗清，例如顾炎武、（“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吴应箕（池州名士，与“明末四公子”相友善）等；有的拒绝合作，决不出山，例如冒襄、（“明末四公子”之一）柴绍炳（“西泠十子”之

① 陆世仪《桴亭先生诗集》卷二。

② 顾景星《白茅堂集》卷五《元夜》。

一)等;有的则抛弃家室,遁入空门,例如归庄、(昆山名士)方以智、(“明末四公子”之一)等。

另有一批在故明已经入仕的文人士大夫,表现出奴颜媚骨,例如钱谦益、(“江左三大家”之一)龚鼎孳(“江左三大家”之一)等;有的则徘徊动摇,一改初衷,例如吴伟业、(“江左三大家”之一)侯方域(“明末四公子”之一)等;有的则属于他们的亲属师长虽与清王朝对立,但本人却愿意在新的政权中寻找出路,施展才华,例如陈维崧、(“江左三凤凰”之一)黄与坚、(“娄东十子”之一)王抃(“娄东十子”之一)等。

尤侗与上述那些决不跻身清廷,并与之对抗到底的文人比较,由于他与他们的家庭、处境等都不尽相同,难以进行对照分析。下面,我们试图以投降者、动摇者、愿意与清廷合作者作为参照座标来说明一些问题。

投降者以“江左三大家”的钱谦益、龚鼎孳为代表。

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江南常熟(今属江苏)人。明天启时曾与魏忠贤阉党集团作过斗争,博得士林的称赞,成为复社的领袖人物之一。魏忠贤的干儿阮大铖进《东林点将录》,在一百〇八人中列牧斋第三名,是阉党必欲杀之而后快的主要对象之一。崇祯间官至礼部侍郎。在南明小朝廷官拜礼部尚书。他为了在官场站稳脚根,便向马士英、阮大铖一伙权奸献媚取宠,这时的牧斋,“毫无经济,惟党于马、阮”,^①已由一个复社的主将堕落为马士英、阮大铖之流的马屁虫,预示着他在清兵南下时也不可能持守气节。乙酉清兵渡江,包围南京,妓女出身的夫人

①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下。

柳如是鼓励牧斋殉节，她也自杀。牧斋声言不能死，柳如是“欲夺身沉池水中”以激励牧斋，牧斋死死抱住不放，“持之不得入”。^①清兵打到南京郊外，钱谦益贪图荣华富贵，竟带领僚属数百人冒着大雨跪迎清兵，率先投降。

龚鼎孳，字孝升，号芝麓。江南合肥（今属安徽）人。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兵临北京城下，明王朝大势已去，妓女出身的夫人顾媚劝芝麓自尽，自己也随同一死，芝麓不肯。城陷，投降大顺政权，授北城直指使。事后，他为了掩盖事情的真相，反而倒打一耙，把责任完全推给顾媚，说她贪生怕死，累及自己。清兵南下，芝麓又投降清朝，官至刑部尚书。

钱谦益和龚鼎孳在明清易代之际，为了保持他们大地主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贪荣华、恋富贵、轻名节，人品实不足取。

动摇者以“江左三大家”之一的吴伟业和“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为代表。

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江南太仓（今属江苏）人。二十岁进士及第，廷试赐一甲第二名。此次会试，尽管梅村才华富赡，但主考者也的确有所关照。事泄，御史参论，因崇祯帝在梅村的试卷上批道：“正大博雅，足式诡靡。”从此“人言始息”。^②如果不是崇祯帝御批结案，梅村将难脱此灾祸。第二年，崇祯帝又钦赐完婚。梅村的业师、复社领袖张溥为自己的学生贺喜，以便提高梅村的社会声望和文坛地位，并为此举行隆重的虎丘大会，山左江右、晋楚闽浙的士子参加者数千

①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下。

② 郑方坤《本朝名家诗钞小传》卷上本传。

人，倍极壮观，“天下咤叹，以为三百年来未尝有也”。^①之后授翰林院编修等职。南明拜少詹事，因与马士英、阮大铖不合，两月后辞职，这一点比钱谦益巴结马、阮要好得多。清兵占领苏州，侯方域移书劝梅村勿仕清朝，梅村依之。他本来也下定决心“易世后杜门不通请谒”，^②但梅村胆小，恐怕清廷寻机报复，加上父母劝他出仕，他才在矛盾的心情中北上，官国子监祭酒。仅只一年，借后母去世，“丁忧”回乡，后来便再也没有出山。

侯方域，字朝宗。河南商丘（今属河南）人。父恂，崇祯时官户部尚书，曾与阉党集团做过斗争，被削籍。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侯恂投降农民军，自成败，返回家乡。清兵占领江南，朝宗移书梅村，劝他勿仕清朝，提出“三不可”：“学士以弱冠未娶之年，蒙昔日天子之殊遇，举科名第一人，其不可者一也。后数岁而仕官赞，学士身列大臣，其不可者二也。清修重德，不肯随时俯仰，为海内贤士大夫领袖。人生富贵荣华不过第一人、官学士，足矣。学士少年皆有之，今即再出，能过之乎？奈何以转眼浮云，丧我故吾？其不可者三也。”^③这话对别人说得可谓振振有词，头头是道，可是轮到自己身上，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顺治八年，清政府欲追究朝宗曾经在扬州帮助史可法赞画军务、抗击清兵的问题，事情虽已过去七八年，却做为一桩旧案重新提出来，而要免于追究的条件，便是朝宗必须参加河南乡试，以示愿与清王朝合作。这件事本来

① 顾雪堂《梅村年谱》卷一。

② 顾湄《吴梅村先生行状》，引自靳荣藩《吴诗集览》。

③ 侯方域《壮悔堂文集》卷三《与吴骏公书》。

是有背景和用意的，清廷玩弄了一个小小的欺诈术，结果朝宗果然乖乖赴试，中副车。从此他便投靠清王朝，进献“剿议”和“抚议”的“弭盗方略”，^①积极为清王朝镇压山东榆园农民军献计献策，清三省总督张存仁“用其计，盗悉平”。^②朝宗从建议史可法团结人民抗击清兵，发展到后来帮助清廷镇压人民，并且力劝别人隐逸林泉，自己却出山应试，做人实在是不高明。康熙时有人写诗讽刺朝宗：“侯生磊落佳公子，壮悔堂文类八家。曾约梅村辞服匿，复从菜地羨袈裟。跡回竟作河间妇，心热俄希上苑花。三策未收资志歿，空留高调怨琵琶。”^③诗中说的“心热俄希上苑花”，即指朝宗希望为清政权作官效命。

吴伟业和侯方域在明清易代之际，都属于三十多岁的中青年文士，他们胸怀大志，才华横溢，在士林中声望很高，于是成为清廷网罗的对象，对他们施加压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因为梅村和朝宗自身立志不坚，也就屈从就范。朝宗身为贵公子，混迹青楼，过惯了灯红酒绿的生活，黄宗羲说他“素性不耐寂寞”，^④确实道出了此人志节有亏，自食其言的思想根源。梅村曾受明王朝的殊恩隆遇，身为大臣，在易代之际竟辱志失足，又事新朝，授国子监祭酒，但在一年后便借故辞归，急流勇退。梅村很有自责的精神，尤其是到了晚年，更加悔恨自己的过失，曾作《贺新郎》词书恨：“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求活。艾灸眉头瓜喷鼻，今日须难诀绝。早患苦重来千叠。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间事，

① 侯方域《壮悔堂集》卷四《上三省督府剿抚议》。

② 《清史稿》卷二三七《张存仁传》。

③ 叶矫然《龙性堂诗话续集》。

④ 黄宗羲《思旧录》。